

在陕报的那些日子



到顶的卷筒纸占去了一大半空间。就这三两张桌子也少有人坐,大家喜欢端着大老碗吃蹴在礼堂屋檐下的水沟牙子上吃饭,边吃边聊,交换信息,每天都演关中农村的老碗会。报社的头面人物,像章彬、张光、程万里、陈明、杨田农、袁良、党沛、毛铸等等,都是老碗会骨干成员。倒是不大见小丁,想是上海人腿功欠火,吃蹴不下来。

印厂有位老师傅是秦腔名旦华美丽的铁杆戏迷,“迷级”超过了现在“粉丝”中的“钢丝”,他听不得别人说华美丽半个“不”字。几个饭场上的朋友逗他,偏偏吃蹴一旁专贬华美丽,专让他听见。你猜怎么着?老师傅呼地跳起来,一扬手抡圆360度,将满老碗旗花面扣在了一位吃舌者的头上,气呼呼地扬长而去。

说到张光,这里还要特意感谢一回。有年夏天,报社组织去沔阳游泳(那时的水还又深又清),我水性不太好,年轻不知深浅,被一股湍流冲到了深处,正死去活来挣扎,张光好似浪里白条赶过来,救小命于鬼门关前。我在沙滩上稍坐,旋又跳进河里,不是不怕死,是想向大家证明自己不怕死,也是想检验一下刚捡回来的这条命好使不好使。最近,我和北京作家徐刚在电视里谈秦岭生态,还调侃说现在的沔阳又浅又浑,怕是连我这“矮脚虎”也淹不死了。

有天我的领导、文艺部主任杨田农交给我一项光荣任务:帮助农民诗人王老九改稿,编发《秦岭》副刊。建国初期,王老九以那首广为流传的《想起毛主席》闻名全国,“梦中心想毛主席,半夜三更太阳起。做梦想起毛主席,周身上下增力气。……中国有了毛主席,山南海北飘红旗,中国有了毛主席,老牛要换拖拉机。”很多人都背诵。

老汉60多了,从临潼来报社,住在地坑里的红楼招待所(曾是国民党省党部),时值冬季,地坑阳光不足,挺冷。我们便到篮球场北边的南墙下晒着暖暖诗。他的诗写在报社200字的直行稿纸上,字有核桃大,边念边改,想不出了便解开裤

袄逮虱子。墙外飘过腊味店的香味,诱惑着还未从大饥饿中恢复的胃。飘过来的还有名女人春女连说带唱的疯话。春女是西安城里家喻户晓的一个传说,小50岁了,家极富而貌极丑,老嫁不出去,导致神经失常,放到现在,堪称超“芥天刺”级的剩女。

一上午诗改完了,经田农审定发了稿。转眼夏天,新华社记者还来拍了《农民诗人王老九》上了陕西日报业余编辑的照片,全国发通稿。画面上,副刊组长吕振岳和王老九作探讨稿件状,著名诗人毛铸和我作陪。遗憾的是,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编改的是哪首诗。那张照片我曾特意珍藏,一珍藏反而找不到了。

又一次,文艺部副主任叶浓交给我和张田一沓稿子,竟是大作家柳青的《饲养管理三字经》。这以前,我曾给柳青、杜鹏程、王汶石等大作家去过组稿信,后来老杜寄来一稿,汶石回信说暂时无短稿,而柳青杳无回音。我不死心,便“打上门去”,跑到长安皇甫村去面约。走进他住的中宫寺,穿对襟褂平头髻的柳青不留面子,说:“云儒,稿子不是‘约’出来的,不是命题写得出的。心里有话才有稿子,有了稿子我会寄去。”他说得很慢,好像在斟酌用词,不要伤了眼前的年轻人。他的目光有一种穿透力,像解剖刀。

现在果然寄来了,是作为自由来稿寄的,秀气的钢笔字写在发灰的糙纸上。在给编辑部的信里,柳青以一位驻村干部的口气,说明编《饲养管理三字经》的用意,是因为农村草料紧缺(那正是“三年困难时期”),想用这种通俗的形式归纳一下喂养牲口的经验,在农村推广。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,觉得有几句韵似可推敲,便斗胆改了。叶浓并不认同我的做法,要我们送去让本人过目。柳青见了我的韵,显然不高兴,“你是南方人,说北京话,我的韵是老陕话,农村好流传。”他又用解剖刀般的眼光,在镜片后面看着我。

《饲养管理三字经》发表后,在农村产生了很大影响,《人民日报》转载了,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。联系到柳青后来写的《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》,预见性地提出陕北应该尽早休耕粮食、还林还草、多种苹果,我对作家乃至整个文化人

的社责任感理解更深了。作家不但是社会和心灵的书记,也应该是社会和心灵的建设者啊。

文革十多年,我离开了报社,待过大巴山的农村,待过三线工厂,待过专跑基层的地市报纸,在命运的颠簸播弄中,在人生的摸爬滚打中,认真阅读中国这本大书。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又调回编辑部,人到中年能重操自己热爱的事业,当然十分珍惜,便一头扎了进去。这期间编辑量较多,消息写作中也总想着探索、出新,便浪得了几个全国、省上、报社的新闻奖。

一天,时任副总编的程万里把我叫去,说《新闻研究》(后来发展为《新闻知识》)的主编刘成祖(程走)约他写一篇研究新闻写作的文章,他选择我的消息写作来评论。我吓得拔腿撒腿地摆手、摇头,连连说不可不可不可。我谈了许多顾虑,说起来就是文革刚过,余悸未消,“椽子出头必先烂”,说时大汗淋漓。万里说现在拨乱反正了,这不是表扬你,而是提倡、鼓励大家解放思想,进行创造性的工作,千万不要有顾虑。难怪他后来调到省委宣传部当领导,到底看得开。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稿子,原来已经写好了,题目是《评肖云儒的文艺新闻写作》,要我拿去看看,提意见。我心不齐地走了。

文章竟有七八千字,通过《看陈毅怎样当市长》《农民进电影公司审片》《世界濒危鸟类朱鹮增加到10只》《秦岭山中记者与野生大熊猫亲密接触》等十几篇消息,总结了我新闻写作的一些特色,如抓特点、抓细节、视角求异、表述明快而人性化等等,多有奖掖。我又读得一身大汗,跑去找主编程走,他和我一道下放汉中,在一个宿舍住过,话好说。我请他务必为万里撤下稿子,我说专门对一个记者的新闻写作作长篇评论,报社还无先例。我是个编副刊的,写消息极少,报社老记者如李迅、王前昆、元树德、薛养玉、车葵、程友民,比我写得多、写得好的多了去了,无论如何这“先例”轮不上我。程走开始还说服我,后来便光笑,可能笑我是惊弓之鸟吧…… □肖云儒

■人物春秋

费孝通「观酒」拿学位

1935年,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,次年,考取公费留学资格,远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进修社会学。1939年春,费孝通根据其出国前,在江苏吴江庙港乡开弦弓村调查访问的结果,写了论文《中国农民的生活》,并将其作为博士论文提交给伦敦大学专门的考试委员会。

论文答辩那天,考官只有丹尼森·罗斯爵士——一位著名的东方学者,答辩地点在费孝通的博士生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家里。为此,马林诺夫斯基特地准备了好几种酒。那天的景象是:会客室内,三人分别落座,罗斯爵士和马林诺夫斯基坐在一张圆桌两端摆放的靠背椅上,而不远处与他们四目相对、拘谨而坐的费孝通手执论文,接受“质询”。答辩伊始,罗斯爵士首先向马林诺夫斯基举杯致意,祝贺他的学生在学术上作出了贡献。接着,罗斯爵士说:“我的夫人已仔细阅读过《中国农民的生活》,是一口气读完的,足见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!”这句话让费孝通颇为惊讶。到最后,罗斯爵士告辞时,还是马林诺夫斯基想起该办的手续,于是请罗斯爵士在一张非常考究的学位审定书上签字,并又喝了一杯酒,祝愿文答辩圆满结束。这期间,本来是主角的费孝通反倒被晾在一边,说话没超过三句,只能不知所措地看着罗斯爵士与自己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推杯换盏。

这场论文答辩,被费孝通后来笑称为“完全走的形式”,全程除了最后的签字,几乎没有与论文相关的东西。但是,这样的答辩却并非儿戏,更非徇私舞弊,而是教育机构基于某名学生惯常学术水准的综合判断。其实,费孝通的成果此前已获得了数位权威学者的好评,拿博士学位属“顺理成章”,于是,论文答辩便沦为“走过场”。

《中国农民的生活》后来经马林诺夫斯基推荐,迅速以《江村经济》为名出版。此书流传甚广,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,被誉为“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”,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。 □祁文斌



一

1961年9月,我开始了在陕报的日子,不到21岁,当然人人都叫小肖。不久发现,大家成天吊在嘴上的是另外一个“小”,“小丁”。“小丁今天说了”“这事得问小丁”“小丁同意吗?”打问“小丁”问什么人?答曰就是丁济沧,我吓一跳,一社之总(那时没有社长)、给毛主席校对过文章的延安老革命,难道可以叫成小丁辈么?可那时上上下下、人前人后谁都这么叫,说是打延安叫习惯了。我叫不出口,硬撑着喊了几个月“丁总”,总感觉有些生分,只好入乡随俗改叫了“小丁”,感觉果然大变,一下便亲近起来。

“小丁”便这样由老丁叫到丁老,由西安叫到北京,由《陕西日报》总编叫成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,一直叫到八九十岁。“小丁”和一个时代、一种风气,一道留在了回忆中。

二

那时陕报在西安东大街,现在的皇城宾馆。院内有一座礼堂兼食堂,可只随便摆了三四张方桌——因为还兼着纸库,码

三

有天的领导、文艺部主任杨田农交给我一项光荣任务:帮助农民诗人王老九改稿,编发《秦岭》副刊。建国初期,王老九以那首广为流传的《想起毛主席》闻名全国,“梦中心想毛主席,半夜三更太阳起。做梦想起毛主席,周身上下增力气。……中国有了毛主席,山南海北飘红旗,中国有了毛主席,老牛要换拖拉机。”很多人都背诵。

老汉60多了,从临潼来报社,住在地坑里的红楼招待所(曾是国民党省党部),时值冬季,地坑阳光不足,挺冷。我们便到篮球场北边的南墙下晒着暖暖诗。他的诗写在报社200字的直行稿纸上,字有核桃大,边念边改,想不出了便解开裤

■往事

《饲养管理三字经》发表后,在农村产生了很大影响,《人民日报》转载了,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。联系到柳青后来写的《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》,预见性地提出陕北应该尽早休耕粮食、还林还草、多种苹果,我对作家乃至整个文化人

■钩沉

五十年代陕西的文学讲座

上世纪50年代中期,我在西安上学。省作协最活跃的一件事便是经常举办文学讲座,几乎每周五,在钟楼东北角或四府街《西安日报》门口,最显眼的广告栏上,就贴出了省作协文学讲座的布告,上面写着本次主讲作家的姓名、讲座的题目、讲座地点以及领票地点。这种活动大都安排在星期天,由于我爱好文学,几乎每次都积极参加。那时,听讲者不用买票,只要到省作协传达室、报社传达室或省图书馆、附近的文化馆,领取入场券就行了。主讲人都是我省大名鼎鼎的作家:郑伯奇、柯仲平、胡采、柳青、戈壁舟、杜鹏程、李若冰、王汶石、魏钢焰、田奇、黄桂华、安旗、王惠、李小巴等作家、诗人、文学评论家,还有一些大学的文学教授,如霍松林、马家骏、候雁北等,那可真是高水平的讲座。题材和内容相当广泛,涉及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。

据当时的省作协副主席胡采说,搞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扶持文学新人,引导他们认识文学、了解文学,正确地走上文学之路。因而,要求作家们在讲的内容上重点

为文学基础知识。要求作家们结合自己的作品来讲,便于引发文学青年的写作兴趣,提高他们对作品的分析理解能力。王汶石的《漫谈创作》,杜鹏程的《保卫延安的创作体会》,魏钢焰的《报告文学的写作方法》,安旗的《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》……都是在这个主导思想下安排自己的讲座内容的。通过这些讲座,对我们这些文学青年有很大的启发和教育。

除了组织讲座,他们还组织了一些有益的社会活动。如1958年,当时著名的诗歌评论家、《延河》副主编安旗老师,除了文学讲座外,还配合了当时的新民歌运动,编印了《诗月号》《诗传单》等。我亲眼看见她和田奇等一些中青年诗人,在钟楼周围大街上向群众散发《诗传单》,并广泛向群众征集新民歌;我还亲眼看见留着大胡子的老诗人柯仲平,在街头朗诵他即兴创作的诗歌。

在青年路“青年堂”举办的纪念马雅可夫斯基诞辰65周年的讲座,就是由当时的省作协主席郑伯奇主讲。那天,特别是一些文学青

年,对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社会地位和文学地位还不是很了解,听讲者座无虚席,除了社会青年文学爱好者,还有各大学的在校文学爱好者。他在讲座中对这位俄罗斯革新者诗人,给予了高度的评价,称他为社会主义的喉舌,诗歌的圣手。讲座结束后,省电台著名播音员林凯朗诵了马雅可夫斯基著名诗篇《关于一个国王和跳蚤的故事》和高尔基的《海燕》,那次可真是一次美妙的艺术享受。

通过文学讲座,我有幸结识了不少只读过他们作品,而未曾谋面过的知名老作家和诗人。他们平易近人,不摆架子,亲近作者,对听众提出的问题总是有问必答,非常热情。这种甘做文学铺路人和引路人的无私奉献精神,深深感动着我们这些文学青年。据说,我们毕业后,这种讲座一直举办到上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才结束。

陕西这块土地,是历史文化积淀最厚重的地方,现在的陕西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学大省,陕西的作家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异军突起,我想,与五十年代的老一代作家艺术家的辛勤扶助是分不开的。 □杜书文

闲话驱蚊

的独特气味可以驱蚊子。宋代科技著作《格物粗谈》中记载:“端午时,收贮浮萍,阴干,加雄黄,作纸缠香,烧之,能祛蚊虫。”这应当算是较早的“蚊香”。

其三,挂蚊帐。蚊帐最早叫作“帷”,就像齐桓公的“翠纱之帷”。但是,穷人可享受不了这种待遇,《后汉书》曾记载,“黄昌多蚊,贫无帷,佣借为作帷。”蚊帐传承至今依然是许多家庭夏天的必备品。

其四,用灭蚊缸养青蛙。古人于大水缸里养青蛙,蚊子爱阴凉,一飞进来就成了青蛙的口中餐。小蚊子,东躲西藏,让人防不胜防,但古人还设计了一种神奇的灭蚊利器,就是在一个盛着水和石头的

大缸里养上一些青蛙,蚊子喜水,不仅需要解渴,而且还必须在水里产卵以繁衍后代,如此一来,盛水的大缸便成了最吸引它们的去处。而它们一旦飞进来,便会被缸中的青蛙一口吞下。

其五,蚊子灯。古人驱蚊灭蚊的工具有很多,《金瓶梅》中就记录了一种叫“蚊子灯”的灭蚊灯,目前可见的实物灭蚊灯出现在明朝。古人的灭蚊灯专门吊于蚊帐内,灯盏的侧面开有一扇小窗。当灯捻被点燃后,有气流从小窗迅速流入,蚊帐内的蚊虫便会被这股气流吸进灯盏内。

挂蚊帐,燃艾蒿两种驱蚊方法,直到现在还有人在使用,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。 □雷焕

陕西省总工会主管主办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刊号 CN61-0015 邮发代号 51-7

中国邮政报刊发行
China Post Newspapers & Periodicals Distribution

随心订阅 “邮”享生活

关注“中国邮政微邮局” 微信公众号

报刊在线订阅网址: BK.11185.cn 客户订阅电话: 11185 全国邮政营业网点 合作服务电话: 010-68859199